

阿 拉 善 盟 文 史

第二辑

阿拉善盟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1 9 8 6 · 4

出 版 说 明

《阿拉善盟文史》是我盟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主办的不定期内部资料集，所选用的稿件，是我盟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民族、宗教、社会等诸方面的重要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及其它有关的历史资料。我们编辑出版《文史》的目的，在于存真求实地记录阿拉善盟历史，供史学界、文教界和社会各有关方面参考，并推动爱国统一战线工作和文史资料工作，为“四化”建设服务。

本辑选用的稿件，是我盟、旗政协委员及各界爱国人士撰写的回忆性“三亲”材料，也有资料、档案、专访撰写的史料。由于撰稿者的经历所限，都不免有一定的局限性，加之我们水平有限错误和不足之处在所难免，请读者、知情者予以补充、订正，共同把《阿拉善盟文史》办好。

凡在《阿拉善盟文史》发表的文稿，未经本会许可，不得全文转载。

编 者

一九八六年四月二十四日于巴彦浩特

目 录

- 德王出走定远营后的一些活动情况 段塔拉腾岱 (1)
- 回忆三十年代阿拉善旗的社会状况 魏文锦 (6)
- 概述国民党政府对原阿拉善旗的统治 戚 涛 (49)
- 我们所知道的达理札雅先生
..... 辛文秀 布音孟柯 玛希巴图 (81)
- 阿拉善旗女子学校简史 朝格图 (101)
- 阿拉善旗保安队沿变 罗阿日斯楞 魏钟文 (109)
- 阿拉善旗人民在解放初期的对敌斗争 杨永忠 (145)
- 补 百灵庙 (169)
- 白 乌兰布和沙漠的汉代屯垦区 (108)
- 内蒙古各盟名称解释 (99)
- 乌滂守备队 (80)

德王出走定远营后的一些活动情况

段 塔 拉 謄 岱

(一) 北上与李守信会合

一九四九年九月，兰州已获解放，银川很快也要解放了。在这种形势下，由德穆楚克栋鲁普（德王）一手拼凑的所谓“蒙古自治政府”已在定远营（阿拉善旗旗府所在地）站立不住了。德王见大势已去，遂决定将“蒙古自治政府”临时迁往阿拉善旗北部的图克木庙。他令其手下的八十余名军政人员，用七十峰骆驼驮上帐篷、粮食等物品，先期到图克木庙扎营。随后，德王本人于1949年9月20日，带上随从图们德勒格尔、吉利占太等出走定远营，直奔图克木庙而去。

这时，原驻宁夏陶乐县的德王旧部李守信、苏和巴特尔等率部（新一旅）东绕鄂托克旗，西渡黄河，北经磴口县，窜入阿拉善旗境内的克布尔、哈鲁乃巴格一带，不久，开往图克木庙与德王会合。途中，他们边走边抢，对沿途牧民群众造成很大祸害。此外，察哈尔、苏尼特一带数旗叛军及逃亡的旧官吏、宗教上层裹胁部分牧民，经中公旗也相继窜至图克木庙，与德王合为一股。

(二) “西进计划”与对边民的抢劫

以上三股势力在图克木庙合为一处后，经商议决定，继续打

着“蒙古自治政府”的旗号，就地整顿军政组织机构，并具体拟定了经额济纳旗进入青海的“西进计划”。

1949年10月份，德王、李守信匪部由图克木庙向西北方向进发。他们途经沙尔扎庙、巴音高勒、苏洪图等地，辗转月余，于同年11月末窜抵阿拉善旗西北部的拐子湖一带。

德王率领的这批乌合之众，沿途所到之处，烧杀抢掠，奸污妇女，使阿拉善旗北部的图克木、红古尔玉林、巴音诺尔公、东、西沙尔扎、拐子湖等巴格的牧民群众遭受了一场空前浩劫。他们匪性大发作，一路且行且止，见什么抢什么，从牧民的骆驼、马、牛、羊和衣物、帐篷、钱财乃至妇女首饰等，都要洗劫一空，就连锅碗家什，供佛之用小铜盏也不放过。不计他们上千人宰杀吃掉的牲畜，只带进拐子湖的牧民骆驼就达两千多峰。

(三) 在拐子湖被围困

德、李匪部的骚扰和抢掠活动，给阿拉善旗边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极大危害。当时，我在北部防卡任队长，驻守北部地区，在这种情况下，我一方面组织民防队，进行武装警戒和布防，另一方面想方设法组织边民搬迁，以躲避德、李匪部的侵扰。不久，旗政府对抗击德、李匪部的斗争作出了具体指示，指示要求我们扩充军队，积极布防，保护边民。同时，还拨给一部分武器弹药。我们扩充军队后，将德、李匪部挤至拐子湖，加以围困。接着，旗政府委派旗保安总队副总队长罗曹格图盖立勒(罗瑞光)、左甲木英敦迪布二人负责北部前线的防务。其任务是力争争取德王投诚，争取不成，就用旗保安队继续加以围困，迫使其就范。

(四) 进行谈判

德王在拐子湖被围困后，进退两难，其处境十分不妙。为了争取德王，罗曹格图盖立勒派段巴特尔与德王联系，德王便派王亲扎布等数人前去与罗曹格图盖立勒接洽派代表进行谈判的时间、地点等问题。罗曹格图盖立勒则按搞定的时间，派甲木英敖迪布和段塔拉腾岱前往德王住地，与德王、苏和巴特尔、吉利占太、塔拉巴等进行了谈判。

谈判中，甲木英敖迪布等先谈了阿拉善旗和平解放的情况和共产党的宽大政策，并向他们转达了宁夏省领导要他们及早投诚，归向人民的诚恳希望。同时，还向他们讲清了利害关系，指出，现正值寒冬季节，你们这么多的人，既没有吃的，又没有住处，靠抢掠牧民是没有出路的。只有听从共产党的劝告，弃暗投明，早日投诚，才是唯一出路。对此，德王回答说：“我们只是为了蒙古民族的事业，才这样苦斗着，又不是当土匪混日子。现在就是给牧民带来一些困难，哪有什么呢？”“阿拉善旗的所谓和平解放，只不过是从一个火坑里跳到另一个火坑里的事而已，这对达理扎雅王爷和阿拉善旗百姓有什么好处？就是我们真的要投降，也只向他们的老子投降，决不会向他们投降的”。

在这次谈判中，因德王坚持顽固立场，劝降未成，只是在以下几个方面达成了协议：

1、德王答应管束其部下，不再抢掠附近牧民，禁止骚扰活动。

2、德王同意派吉利占太、陶布新赴定远营进一步谈判，阿拉善旗方面保证其代表在十五天之内返回住地。

3、双方一致同意，德王与罗曹格图盖立勒二人继续保持联络，德王率部迁至拐子湖纵深地带过冬。

这次谈判结束后，于1949年11月末，德、李匪部在拐子湖纵深地带驻下，在罗曹格图盖立勒、段塔拉腾岱和杨艾立肯木（杨富存）等部的监视和围困下，再未敢出来四处抢东西。

（五）德王赴蒙经过

1950年3月初，蒙古人民共和国方面派人向德王提出，希望与德王进行会晤。当时，德王接受了蒙方的建议。然后，双方商定了会晤的时间、地点。

德王来阿拉善旗后，首次与蒙方人员接触是1949年3月份的事。当时，蒙方派丹巴仁钦来到阿拉善旗北部防卡，要我提供德王来阿拉善旗搞“蒙古自治”的活动情况，并约定在三十日到查干陶勒盖边防站（蒙方的）碰头。我按约定的时间到查干陶勒盖边防站，向蒙方的官布提供了德王来阿拉善后的一些活动情况。随后官布拿出两封信交给了我，他说，一封是蒙方致德王的公函，一封是德王长子都嘎尔苏隆写给其父的信。望你带回去交给德王本人。此外，还交给了蒙方赠送德王的缎子、哈达等礼品及德王长子的一条哈达，要段一并交给。

我返回定远营后，就将蒙方的两封信及礼品亲手交给了德王。当即，德王写了两封复信，仍通过我交给了蒙方。

1949年9月中旬，蒙方的巴图吉尔嘎朗来找我，说要前往定远营面见德王，有要事相洽。当我将巴图吉尔嘎朗带回定远营时，适逢德王准备北上图克木庙。德王便对我说：“在定远营不便见面，希你告知来人，明日再在草地等我。”德王于9月20日出走定远营后，在定远营西北方向的乌兰陶力盖与巴图吉尔嘎朗会晤。

巴图吉尔嘎朗对德王说，蒙古人民共和国的代表正在蒙古边境上等候，希你即行前往会晤。德王答道，我到图克木庙后，就

派人前去。当时，双方约定了在中公旗的巴彦陕丹庙会晤的日期。后来，蒙方改变了会晤地点，通知德王前去哈拉敖包赴约。当德王、李守信、苏和巴特尔、敖门巴特尔等，由萨嘎拉团长率领的百余人护送下赶到哈拉敖包时，蒙方再次变更了会晤地点。他们对德王说，这里不便会晤，请到我们准备好的地方去吧。德王见此状况，只好表示同意。他便对萨嘎拉团长安顿说：“你在这里等着，我们于第七天上返回这里”。说完就随蒙方人员向蒙方境内走去。

（六）德、李残部缴械投诚

德王、李守信等赴蒙后，萨嘎拉率部在边境等候了近一个月。他们见德王一行仍不回来，便跑回拐子湖对众人喊道：“德王回不来了，现在各奔前程吧！”随即，萨嘎拉率百余人向西窜去。葛瓦拉希（团长）也率百余人向东窜去，逃至乌兰察布盟后受阻，就向当地解放军投降了。

这时，留在拐子湖的千余名德、李残部，在孙明海、吉尔嘎朗等军官的率领下，就地缴械投诚，后于1950年3月被送到定远营。党和人民政府对这些人作了妥善安置。对于愿当民者，准其在雅布赖、巴音诺尔公等巴格安家落户。

我本人作为上述历史事件的见证人，回顾了自己亲身经历的一些历史情况。如有不妥之处，请熟悉这段历史的同志予以指正。

（额尔敦仓 译 朝格图 校）

回忆三十年代阿拉善旗的 社会状况

魏文锦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是阿拉善和硕特旗（简称阿拉善旗或阿旗）历史上发生深刻变化的时期，当时的旧中国国内四分五裂，民族灾难极为深重。达理札雅就是在这样一个动荡不安的时期继位执旗政的。本文重点记述从达理札雅继位起，他和德王亲善招来日本特务机关及宁夏省马鸿逵用武力突袭定远营的历史事件。为了弄清历史的来龙去脉，必须从当时阿旗的政治环境说起。

我家世属“老四爷”（达理札雅的祖父辈）的哈拉雅图（百姓），居住沙尔布拉都巴格（紫泥湖，今锡林高勒）。自我曾祖玛呢巴德尔在老四爷府内当差，在定远营（今巴彦浩特）赐给土地房屋开始定居。老四爷府在定远营西花园（今园艺场），宫殿式建筑与老府不相上下。四爷的御花园（以前叫“四合园”，也在今园艺场内）内有花亭数处，林木茂盛，中凿一池名曰“如意塘”，贺兰山麓泉水自府外流入四合园直至府内（最早的王府也在西花园，历史上因“回回造反”被烧毁）。四爷府及其花园水池与城内王府、寺庙遥遥相对，各族民舍错落其间，成一整体。三股泉水自东向西流经市区，在市区内架设三座桥。自城门以至南梁贯穿南北的一条大街，与三道河沟构成“王”字形，城墙及城内有一山组成“皇”字形，据说这是阿旗的风水所在。所有布局紧凑，风景秀丽，故定远营素有“小北京”之称。

我的祖父那拉玛、伯父吉布呼冷、父亲乌最司格冷（汉名魏崇德）都相继在老四爷府内当差。我幼时在任老先生的私塾中念了五年书，后来有了新式学校又入校念书。在我十四岁时，达理札雅回旗袭爵，从那时起我就在王府内当小戈什哈（侍从），陪伴达的格格（满语小姐之意）们玩耍，并干一些家庭零星小事。后来到外地读书，回旗后在旗政府任职，一直追随达理札雅，为阿旗效劳。对于达理札雅的家室生活和政治经历及生平遭遇都知其底细。本文内容为亲历目睹，乃就记忆所及把当时所见所闻详尽记述，俾供各方人士收集史料之参考。

一、达理札雅继位

阿拉善和硕特旗辖属于清朝中央理藩院，到了民国以后，阿旗又直属于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旗王塔旺布理甲拉一直住在北平“罗王府”（罗王是第三代旗王，阿旗贵族都姓罗始于此），旗政由历任协理主持。这是清政府遗留的制度（旗王驻京，生活贡奉由本旗负担，协理在旗总揽军政事务），民国时期相沿未变。塔王于一九三一年在北京病逝。不久塔王的次子达都拉旺希格也因骑摩托车肇事身亡，儿媳（次子之妻）为夫表节自杀。王位应由塔王的长子达理札雅承袭。塔王逝世不久国民党国民政府即下文准达理札雅袭王位。按惯例袭爵大典必须回旗举行，同时塔王及二爷夫妇的灵柩也必须运回本旗祖陵内安葬。袭爵大典因服孝期间不能举行，俟三年孝满在旗内庆贺，因此只是在北京府内举行了小型的简单仪式。一九三二年“太福晋”（达母）主领达理札雅及全家人等由北京起灵回旗。事先，阿旗政府重新整修了定远营城内王府，又派协理罗巴音都龙率领数十名戈什哈前往北京迎接。北京至包头一段是乘专列火车，包头至定远营则动员全旗组织了庞大的骆驼队和骆驼轿、马轿，分别驮运灵柩和达

理札雅全家老幼及男女侍从人员。抵定远营后，尚不能先回王府，而是住在距定远营十里之遥的扎哈乌素，待选择“黄道吉日”先行安葬死者，按旧例一切应有仪式处理完毕，方得回府安居，然后再择吉日举行袭爵庆贺。

为了迎接老王灵柩及新王归来，在扎哈乌素下了七、八顶蒙古包、二十多顶帐篷。前来欢迎的蒙、汉、回各族居民熙熙攘攘络绎不绝，盛况可与那达慕大会相比。安葬那天灵柩，用六十四人抬的大杠由扎哈乌素一直抬到老陵滩陵园。棺木外面有棺罩，面子是黄缎子绣有龙凤，抬杠者是青年壮工，沿途不能歇缓，纸人、纸马、牛、羊、车、驼及各种纸幡应有尽有，仪仗和差役人等数以百计，均身披重孝，浩浩荡荡拥护前进，自日出至日落整整一天才结束了葬礼。太福晋率达理札雅全家老幼始回城内王府安居，至于当日及此后若干天内召请大批喇嘛、和尚诵经超度亡灵更乃礼仪之须，不消细说。

老王已经安葬，小王必须迅速登基安抚人心。王府大门内是一幢五间大庭，匾额上是“迎恩堂”三个大金字，这是清代王爷迎接皇帝圣旨的地方，“迎恩”即迎接皇恩浩荡的意思。迎恩堂东侧是“回事处”，西侧是“典仪处”，平时每逢农历年节或其他大典，王爷和福晋（夫人）要在堂内升座接受臣民的大礼参拜。但是应该指明，达理札雅回旗已是民国二十一年（一九三二年），而清代皇封的王爷仍得世袭，袭爵大典依旧沿用清代的礼仪，似乎不合“民国”体制，然而无人提出异议。南京国民政府居然默认这一事实。这次大典虽因服孝期间不能举行全旗性的隆重庆贺，所用的仪仗依然有伞、棍、旗、牌、金、瓜、斧、钺、节、扇等。达理札雅头戴紫宝石顶帽、三眼花翎，身穿马蹄袖绣金蟒袍，足登朝靴；福晋则着阿旗蒙族服装，身穿长袍坎肩儿，头戴两颗珊瑚珠，两条辫子用缎子辫套套着通过坎肩垂挂在胸两侧，珊瑚珠前面戴着用五光十色的宝石镶嵌着的帽结子，足登薄底优

质皮靴。夫妇双双先到大佛堂(即王府的上屋)向列祖列宗行礼，然后至迎恩堂登上宝座，接受群臣的“三跪九叩”拜贺，全部仪式过程庄严肃穆、气势非凡。

达理札雅袭爵后，于第二年(一九三三年)全家又回了北平，旗政由老协理罗巴音都楞、副协理罗恩凯巴图、老管旗章京和尚满吉、副章京图布吉日嘎拉、齐吉兰泰、那筭达来主持。一九三四年达理札雅第二次回旗亲政，将老协理章京准长假请退，起用了年轻的罗恩凯巴图为协理兼保安总队长，罗巴图孟柯为副协理兼任保安总队参谋长，陈爱尔德呢巴图为管旗章京，段巴特尔为副章京。此数人均为达理札雅袭爵后起用的重要辅弼，是有功于王室的忠贞不二之臣。

早在一九二八年老王塔旺布里甲拉在世时，阿旗发生了著名的“小三爷”事件。贵族(台吉)小三爷德毅忱勾通国民党宁夏省主席门致中(为西北军将领)，以“革命”和“民主”为号召，在阿旗领导武装暴动，推翻了王权统治，占领定远营，成立“阿拉善旗政务委员会”，建立了新政权。阿旗保王派军民则包围定远营，坚决要复辟王室。门致中第一次派军一个营(营长姓彭)支援小三爷，被阿旗南部保王军指挥官毛巴特尔、范布尔古德、罗恩凯巴图率领的蒙古兵击溃歼灭。第二次又派苏雨生旅由贺兰山镇木关进入定远营，始解除了保王军的包围，稳住了小三爷的政权。罗恩凯巴图鉴于保王军失败是由于缺乏武器，即前往北京向塔王报告(当时塔王在北京遥控局势)，塔王亲自率次子达都拉旺希格、罗恩凯巴图、马宾等一同前往东北，向东北军张作霖求援(塔与张素有交往)。张支援了三八式步枪五百支、重机枪两挺，交罗恩凯巴图立即运回阿旗武装保王军，终于击溃苏雨生旅，推翻了小三爷政权，恢复了王权统治。罗恩凯巴图为王室立大功。罗祖上七代均任协理，在阿旗贵族中(台吉)与王室较系近支，此次又保王有功，故达理札雅袭王后，首先委任罗恩凯巴图为副协理兼

保安队队长，不久即晋升为正协理。

一九二六年冯玉祥由外蒙回到五原，率部途经宁夏前往河南，为便利军需运输，在阿旗磴口巴格设立兵站（后来交宁夏改为县治），并向阿旗派交骆驼七千峰，委任军官姚连帮率军（约一个营）坐镇定远营监督旗政府积极催办。在小三爷事变中姚连帮奉命武装支持小三爷。贵族罗那木吉勒（罗巴图孟柯之父）、罗达喜道尔吉均系旗府的协理，都是当时维护旧政权的主要人物。在一次赴姚连帮的宴会后，罗达喜道尔吉回家即死亡，罗那木吉勒不久亦死去。后来捕获的暴动方面第二旅旅长罗敷有供称罗确系姚连帮下毒害死。后小三爷失败逃亡北京被塔王发现，派罗巴图孟柯追捕，一直追至归绥（今呼市）缉拿归案。因罗巴图孟柯父子两代都对王室忠诚并立过功，其祖辈亦曾担任协理，故达理札雅委任罗巴图孟柯为副协理，兼任保安总队参谋长。陈爱尔德呢巴图之父陈莽哈来原系旗政府管旗章京，是旧政权的忠实保卫者，在事变中被杀害。陈本人在事变中对王室有功，达理札雅即以陈爱尔德呢巴图继父职任管旗章京。协理和管旗章京乃王爷之下掌管军政大事的最高官职。达理札雅以三位年轻忠贞有功之臣作为自己的辅弼，改变了阿旗落后瘫痪的局面，王权巩固，民生乐业（小三爷事件的细详内幕在这里不一一记述）。

一九三四年达理札雅偕福晋金允诚及其格格们又由北平返旗，太福晋（达母）和三爷（达之三弟）达穆林旺楚克则仍留北平王府居住。这时小三爷事件造成的混乱局面已被廓清，旗政府主要人物均已替换，上层班子更为年轻，全旗形势安定，达理札雅过着尊荣闲适的贵族生活。王府内的戈什哈都经过挑选，多数为精壮驯服的年轻人，总共有六、七十人之多，侍女、保姆之类有二十人左右。当时达理札雅有四个格格，长者只有十一、二岁，因府内全为成年人，缺少童年人陪伴，颇感枯寂，因而将老戈什哈的子女挑选七、八人进府当小戈什哈，计男的有张宏达、张元

惲、王励德、魏文锦、徐明珍等；女的有徐玉珍、杨风英、喜儿、魏玉霞等，都为十四、五岁的少年。当时能经常出入王府，在王爷福晋跟前当差被视为是件非同小可十分光荣的事，也是王爷的恩赐，照例由我们的父辈带领向王爷福晋叩头谢恩。我们的任务是成天陪伴格格们在府内游戏玩耍，中午在府内吃饭，王爷福晋一家人吃完后我们就和值班的戈什哈老嬷嬷们一起吃。有时王爷福晋有些零星小事也指使我们小戈什哈去干，但不经常，因为许多大戈什哈在随时听候差使，用不着我们小的。

达理札雅喜爱狼狗，由北京带回一条母狼狗，起名“宁格尔”，来旗后又生下两条小狼狗，起名“古力”和“嘎力”。狼狗性格喜动，活泼、顽皮，不是这里啃就是那里咬。那时府内听差的戈什哈逢年过节都带顶帽，穿袍褂鞋子，夜间戈什哈值班在王府住宿、睡觉时脱下的衣帽往往于第二天早上不翼而飞，原来狼狗给叼走了，有时狼狗叼住帽带一甩，把顶帽扣到头上满屋乱跑。戈什哈找不到帽子恐王爷喊叫急得团团转，可是王爷福晋和格格们见了反而开心大笑。有时狼狗把鞋叼走寻不到，还得回家另找鞋穿。我们小戈什哈每天要为狼狗洗澡，有时还要牵到大街上遛一趟。狼狗洗澡时，有时王爷来了，狗表示为对主人亲热，就跳跃着向王爷身上乱扒，泥水溅满衣襟，王爷也不在意，回屋换一件衣服完事。

王府内东院养有一二百只鸽子，都是从北京运来的，有红的、白的、黑的，花色品种很多，专门有个姓焦的喂养，每天早晨要放在天空中飞翔，带有哨子，发出悦耳的哨音，王爷福晋每天都要来东院看鸽子作为消遣。因为王爷福晋身份高贵，不能随意出门上街，处理旗政也是协理、章京亲自到王府请示，大事由王爷裁决，小事则由旗政府各主事人员自行处理，由协理总揽其成。那时政简事少，须由王爷亲自裁处的事情不多，达理札雅除偶而会客外，无事可做，就只有玩狗、看鸽子、骑马打枪作为日

常消遣。

达王最爱马，也善于骑马，王府内养有二、三十匹骏马，王府东面有上下两个马厩，设有“达木勒”数人专门负责养马。张倚就是达王的养马专职“达木勒”，还由一名从北京带来的养马、驯马的“马倌”（技师）叫文松波，专门为达理札雅调理走马。达王每星期日要去郊外骑走马奔跑几十里已成惯例，不论冬夏，五六点钟起床，吃完早点，带上戈什哈，骑上他那二三十四走马，前呼后拥出城而去。随从人员都带有长短枪支、望远镜、照像机等。贺兰山麓或沙漠边缘丛生灌木中常有野兔、野鸡、黄羊等野生动物，骑马打猎就更为有趣，往往是满载而归。每次骑马均在上午十时左右回府。

达很爱玩枪，什么双筒鸟枪、单筒鸟枪、各种步枪如日本的三八式、苏联的水连珠、德国的套筒应有尽有，特别是手枪更为讲究，各式枪支共几十种。新的多了，旧的就卖给他的随从人员。后来国民党高级官员会见他都要送他一把手枪，如蒋介石、戴笠、朱绍良、张学良都曾送过他漂亮的手枪。

达王还擅长照相，他存有各种各样的照相机，型号有六寸照相机、有120的、有135的，牌号有当时德国最高级的来卡、彩色康太克司等。此外达王还喜欢钟表，有各种怀表、手表数十块，经常拿出来独自欣赏。他有个特殊性格，凡是心爱的东西总是舍不得使用，珍藏起来，只供自己观赏或供客人看稀罕，以示阔气，沾沾自喜。

达王的穿着也是很讲究的，满清的顶戴袍褂整套齐全，民国的军装马靴、长袍、马褂，以至西装革履无不具备，而且都是优质美观，经过认真选择十分考究的上品。

吃的方面设有大厨房，专由北京带来邢雨亭、高松亭两名高级厨师，阿旗当地厨师则有薛五七等四人，每日三餐，按规定每餐十六个菜，主食有大米饭、花卷、面条、大米稀饭，糊米粥

(把米炒黄易消化)等。这些饭菜吃否不一定，但每餐必备。另有小灶专做达王喜欢的可口饭菜，主持人是王妈(张根敦之妻)，大家都称她王大大(北京人称伯母为大大)。张宏达的父亲张九爷(张根敦又称张九爷)是达幼年时的侍从(戈什哈)，达当面称他为“老戈”，以示亲昵尊敬之意。

达王本人读书不多，文化程度乃属一般，但颇有教养，讲究排场礼节，善于交际应对，谈吐文雅，态度稳重大方，自幼在北京长大，见识到大都会的生活，接触的达官贵人，崇尚外国新式用品。回旗袭王后深感蒙旗没有学校，文化落后，乃蒙古民族衰弱之根源，要复兴民族必须首先兴办教育，因而于一九三四年秋在定远营成立了第一所小学校。开始学生只有十余人，是王府和旗政府职员的子弟，由旗政府抽调一名台吉(贵族)道尔吉僧格任教师。因他识汉字不多，暂时只教蒙文。没有课本，只得教念蒙文佛经——阿拉善桑(佛经名称)，但不久即建成完全小学校读汉文，派阿旗的“北公爷”塔旺策林任校长，前旗府秘书长于来堂之子于培根任教导主任，胡湘洲、叶庄之、王枕华任教员，学生也增加到六、七十人。三七年还成立了女子小学校，由达王的福晋金允诚任校长，教员由金慕然、杨秀梅、金风臣、王志英、聂正举等，学生约有二十名左右，包括达的女儿，旗府官员的女儿，也有少数仕绅的女儿。学生的课本是由北京买来的。为了方便，由北京聘来印刷工人田子扬在定远营开设一所石印局，为学校印刷练习本，描红方格、蒙文课本等(由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审定的汉文课本译成蒙文)，同时也解决了旗政府公文文件的印刷问题。小学开办后即有五年级，学生有魏文锦、张宏达、王福宝、吴登弟、刘卓元等五人(因这五人都读过私塾)，这五人是阿旗有史以来第一次成立新式完全小学的第一期毕业生。

达理札雅回旗袭职后，除政治方面起用两位年轻章京，励精

图治百废复兴外，军事方面成立“区防司令部”，下设参谋、军需、军法、副官四大处，达自任司令，把原来的亲兵马队改编为阿拉善旗保安总队，下设八个大队，补充了武器弹药，改换了服装。又从外地聘请了年轻军事人员陈匡、李子元、叶庄之为军事教官进行军事训练。自此达理札雅在阿旗长期定居，逐渐建立威信，王位巩固、境内安谧，民生乐业、盗贼不兴。

二 德王的蒙古自治运动对阿旗的影响

三十年代旧中国国内敌对势力错综复杂，军阀政客勾结帝国主义列强横行霸道。“九·一八”事变后民族灾难空前深重，社会动荡民生凋敝，国民大众惶惶不可终日。地处西北边陲的阿拉善旗并非“世外桃园”，刚始袭爵的达王自己也不可能永远安于悠闲舒适的贵族生活，满清皇朝早被推翻，民国政局混乱不定，他既没有可资依赖的政治靠山，也很少与外部联系足为援助。宁夏省主席马鸿逵之父马福祥与达理札雅之父塔旺布理甲拉早年在北平时曾为“换贴弟兄”，故达理札雅与马鸿逵青年相识亦为“兄弟”，但马鸿逵自任省主席以来，以阿旗地处宁夏省辖境内，区域辽阔物产丰富，即有吞并之野心。达理札雅自回旗主政之初也有所觉察，故二人虽系“世谊”却是貌合神离，互不相让，此后省旗龃龉时有发生，矛盾日趋尖锐。马无时不思有意制服达，达亦时刻在防范马，颇思取得外援以抗马。但年轻的达理札雅只在北平时曾结识东北的张学良，且仅系青年“公子”吃喝玩乐的“知友”，却非政治上亲密合作的伙伴。虽然“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的东北军驻防陕西期间，一九三五年农历十月一日，张学良由北平乘飞机去西安，特经定远营上空飞过，飞得很低，给达扔下一信，也只是旧情往来，尚无具体政治联系。此外达理札雅与南京国民党政府素无接触，国民党政府军政大员对达亦并不